

胡瑗：北宋理学先驱和教育家

□邱贵平



如皋安定小学内的胡瑗塑像



宋太宗淳化四年(993)四月初八,胡瑗生于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(今如皋市如城镇)。

胡瑗自幼聪颖好学,7岁善属文,13岁通五经,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。在外求学多年后,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如皋,然而却七次应考不中。40岁时放弃科举意念,前往泰州城,在华佗庙旁经武祠(后江苏省泰州中学所在地)办起了一所书院(私塾),并以祖籍安定立名,称安定书院。

宋景祐三年(1036),经范仲淹引荐,胡瑗以布衣身份,与杭州知府(亦为音乐家)阮逸同赴开封,接受正急于雅乐改进的宋仁宗召见,并奉命参订声律,制作钟磬。其间,他合乎古礼的文雅举止深得朝中要人的赞赏,事成后即被破例提拔为校

书郎官。

康定元年(1040)八月,胡瑗随镇守延州(今陕西延安)的范仲淹到陕西,被举荐为丹州(今陕西宜川县)军事推官。此间撰《武学规矩》一书,提倡国家大兴武学,以抵御外部侵略。

庆历元年(1041),胡瑗调密州(今山东诸城)任观察推官时,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家奔丧。翌年复出,改任保宁(今浙江金华)节度推官。不久应湖州(今浙江湖州)太守滕宗谅之邀,到当地的州学任主讲教授,以至“四方之士云集受业”。其间提出了“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,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,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”的至理名言,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“湖学”。

庆历四年(1044),范仲淹推行新政,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中央太学。皇祐二年(1050)十一月,朝廷再次更定雅乐,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,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用三年时间完成。此间两人还合作撰就了《皇

祐新乐图记》三卷。1052年,他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(主讲教授),晋光禄寺丞。被征为太子中舍,后以殿中丞致仕。

嘉祐元年(1056),64岁的胡瑗晋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,成为当朝太子的导师。

晚年,胡瑗依旧苦读勤教,并参议朝政。嘉祐四年(1059)终因积劳成疾而卧床不起。后经仁宗皇帝钦准,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疗养。临行前京城轰动,相送者“百里不绝”。不久即病故,被朝廷追谥“文昭”,葬于湖州原菰城附近。

胡瑗被王安石誉为“天下豪杰魁”;被范仲淹尊为“孔孟衣钵,苏湖领袖”;文学家苏东坡曾写下过赞颂他的诗句:“所以苏湖士,至今怀令古”……

胡瑗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,与孙复、石介并称“宋初三先生”。他精通儒家经术,以“圣贤自期许”,讲“明体达用之学”。他认为,儒家的纲常教是万世不变的“体”,而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

“文”。把体、文付诸实际,可以“润泽斯民,归于皇极”,达到民安国治、维护统治的目的,这就是“用”。他的“明体达用之学”,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。胡瑗讲学分经义、治事二斋,治事包括讲武、水利、算术、历法等,表现了重视经世致用的特点。

胡瑗在生前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,集教学理论、实践和改革于一身,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。其主要贡献为:确立培养“致天下之治”人才的教育理念;纠正朝廷取士时的弊病,要求德、智、体、乐全面观察;实施分科教学;推广普及教育;严格校规,讲求言传身教;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及创立高校寄宿制度。著有《松滋县学记》《周易口义》《洪范口义》《论语说》和《春秋口义》等。

胡瑗毕生从事教育,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,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,依然熠熠生辉。在如皋,现有安定街、安定小学,建有安定广场,广场中心有安定先生的雕像,皆为纪念胡瑗的场所、标志。

(图片由南通市政协提供)



江海风物

雨伞

□孙小林

“撑着油纸伞,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。”这是戴望舒先生撑在濛濛的江南雨巷里的油纸伞。

据考,伞的诞生至今已有3500多年历史,初时被人们称之为“簦”。公元前十一世纪,就有了用帛制成的伞,但只有上等人才能够享用。据查证战国时秦穆公是最先使用伞的人。后魏时期,伞普遍用于官仪,老百姓将其称为“罗伞”。官阶大小高低不同,罗伞的大小和颜色也有所不同。皇帝出行要用黄色罗伞,以表示“荫庇百姓”,其实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遮阳、挡风、避雨。伞在中国诞生之后,随着对外开放和交流的日益扩大,也逐渐传到国外。

也有传说伞是由鲁班的妻云氏发明的。

春秋末年,鲁班常在野外作业,遇上大雨天,来不及躲闪,常常被淋湿。鲁班的妻子云氏看见鲁班常遭雨淋,便决心做一种能遮雨的东西为鲁班解忧。她用捡来的竹子劈成一根根的细条,然后在细条上蒙上兽皮,张开来,样子像一个“亭子”,收拢的时候如一根棍子,可以随身携带。下雨了,一撑,就不用再担心被雨淋湿了。这就是后来人们使用的雨伞。“劈竹为条,蒙以兽皮,收拢如棍,张开如盖”,这个传说距今只有两千多年,看来不太准确。

据考证,最初的伞是以羽毛、丝绸等物料制作,自发明了纸以后,以纸代替丝,制成纸伞。宋时称绿油纸伞,以后历代均有改进,油纸伞、油布伞、编式伞,最后演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和使用的各种各样的伞。

东汉蔡伦造纸,便出现了在纸面上涂桐油的油纸伞,但那时的伞主要是黄纸做成,这说明我国油纸伞的历史距今已有2000多年了。唐代,油纸伞广泛在民间使用。这一时期,由于出现了专门用于书画的宣纸,便有了用宣纸做伞面、书画家在伞面写字绘画的书画油纸伞。也是这一时期,油纸伞传播至日本、韩国、南洋等地。

油布伞的制作历史,大约可以追溯到大面积种棉花织棉布的宋代。北宋画家张择端已经把油布伞画在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市井风情里。画面上,许多摊贩在摊子旁边支着一把大大的油布伞。

油布伞和油纸伞的制作工艺基本相似,只是伞的面料不同,油布伞是一种由涂上熟桐油的布料做成伞面,相较于油纸伞更加结实耐用。据伞业传承人介绍,制成一把油布伞,需要12道大工序,88道小工序,从选竹、做伞骨、制作伞柄、车制伞芦,再到裁布、制作伞衣、糊伞面,工序十分复杂精细。

在完成了选材、刨竹节、分片、打孔、排竹、套伞头、连接伞骨与伞头、制伞面、上布这几道工序后,伞的样子就已经出来了。接下来是整个油布伞制作工艺中的重头戏:熬桐油。桐油熬成了,刷在伞面上,再晾干,一把油布伞就做成了。

《天工开物》提道:“凡糊雨伞与油扇,皆用小皮纸。”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也提道:“以新赤油伞,日中覆之。”通常,江南地区的气候潮湿多雨,使制伞业十分蓬勃。在一些文学作品如《白蛇传》中也可以看到油纸伞的影子。

油纸伞除了是挡阳遮雨的日常用品外,据说还曾是传统的嫁娶婚俗礼仪不可或缺的物品,传统婚礼上,新娘出嫁下轿时,喜娘会用红色油纸伞遮着新娘以作避邪。中国油纸伞传播到日本后,经过改进,发展成今天日本人依然使用的“和伞”。但是,在苏中乡下,伞却是一件忌讳的物品,新人结婚现场不希望看到伞,或许是伞的字音跟“散”相同所致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记忆里,笨重的油布伞,是陪着人们走过风风雨雨的老伙伴。

我曾经渴望能拥有一把雨伞!但在我的童年时代,却没有多少雨伞的记忆。上学的时候,同学们的雨具大多是头戴一个“斗篷”(芦苇制成的类似斗笠的东西),身披一件蓑衣,有的披一块麻袋片,到后来才有人披塑料薄膜,于是,一个个十分羡慕那些打伞的人,打伞的人在人们眼中都是些有身份的“贵族”。于是,能够拥有一把雨伞成了我们的梦想。大概在我上中学的时候,我家终于有了一把油布伞,黄色的伞面,骨子很硬的那种。这把伞在我印象中似乎从来没有新过,颜色一点不鲜亮。因为我们兄弟姊妹多,家里只有这一把雨伞,宝贝儿似的搁着,遇到雨天了,你想打,我想打,他也想打,干脆谁也别打。往往就是这样,一件东西,不管你用还是不用,到了一定时间,它会自然而然地腐蚀或损坏,我家的这把伞,不几年就坏掉了。母亲当然不甘心,拿去请修伞匠修理了下,或许是修伞匠技艺不高,修理过的伞使用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进退自如,常常出现问题,放家里,下次再撑开来,发现已经断了一根骨子,再下次又断了一根两根,渐渐不再有人问津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由于钢架伞的普及,油纸伞、油布伞等雨具被钢架伞、折叠伞取代,于是,油纸伞、油布伞便逐渐退出市场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瞧瞧状元写给儿子的信

□蒋长云



大清光绪甲午恩科一甲第一名、状元张謇115年前在南通州城南营造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——南通博物苑时,遇到了一丢丢小麻烦。

他在给儿子张怡祖张孝若的信中写道:

范西沈约六月迁,吴约六月九月迁。两家儿子皆顽劣,很戾不驯,屢推我已砌之墙,坏我已装之窗,父亦不与校。前出赏格,令人侦捕,稍平静,今又作恶。此等即国民党人小影,与校伤我量,不校则可厌。好在砖瓦也来不及,姑忍之耳。凡事有可任意者耶?处乡里尤宜和厚。

没有拆迁办专业的、程序化的运作,没有公开公平公正的官方政策,没有深入细致的思想和深明大义觉悟群众,有的是钉子户的缠绕不清,状元公感到很郁闷、憋屈、很无可奈何。人家啬翁当年凭一己之力为南通人民办点实事好事容易么?!

状元毕竟是状元,这个令他头大的棘手的难题还未有解决之策时,先被他随手拿来作为教育儿子的活材料。这一纸看似不经意的家书,仔细品品,大有教益。

他不说是沈家人怎么怎么、吴家人怎样怎样,特别强调作恶的是两家人家的儿子,皆顽劣,很戾不驯,可厌。隐言我书香门第张家的儿子可万万不能像他们一样令人生厌,其实是提示儿子要引以为反面教材、引以为戒。

“与校伤我量”,微言大义。伤我墙、伤我窗,都可“姑忍之耳”,与墙和窗相比,量则更重要,更加伤不起。何为量耶?雅量、肚量、气量。宰相肚量能撑船。正人君子须有气量,不可心胸狭窄,睚眦必报。与小人斤斤计较,

伤了自己的气量,殊不值当。

“凡事有可任意者耶?处乡里尤宜和厚。”便是人家打上门来,也不能意气用事,任意而为。“前出赏格,令人侦捕,稍平静”,说明采取一定断然措施是有作用的,但啬翁到底还是选择了姑且忍之。乡里乡亲的,尤其应该和睦相处,宽厚以待,以邻为壑、与乡里较个高下,有意思么?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终究不是个事啊。

寥寥百余字,生动的一课。

这一纸家书是我在一本名为《父爱如山——清末状元张謇写给儿子的信》的书中读到的。疫情期间宅家无聊,托好友搜集一些季直先生的书法来临。其中有张謇的书法集,也有这本新近出版的南通档案馆馆藏相关史料的影印汇编。整个清明小长假,我都沉浸在这本书信集里,躲进小书房,戴上老花镜,临池不辍,不亦乐乎。

临帖,通常是见字不见文。而这次则不同,百年前乡贤给儿子的家书,讲的是我们南通人熟悉的人事物,书信的内容同样令我着迷。书中总共125通与子书,就书法论,兼有颜鲁公的厚重、苏东坡的洒脱,满纸鸿儒气、长者风。就内容看,事无巨细、情真意切、雅气横生。里面有这位末代状元的时局观、政治观、人生观、事业观、教育观,关于诗文的心得、书法的心得、择友的心得、处邻里的心得,识人的心得、健身的心得、医药的心得,更有关于他仕途的、实业的林林总总和日常家务事方面的絮絮叨叨。

啬翁生不逢时,与子书中常有对时局的忧虑。关于一战的影响,他焦虑道:“欧祸行将及亚,我国如婴儿、如破船,何堪当暴夫,入旋涡也?思之辄悸。”他作如此表达,也是为激发孩子的家国情怀,欲其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。关于为人处世,他在信中希望怡儿“自重自

爱”,“养成一种高尚静远沉毅之风,不至堕入浮嚣浅薄诞妄之路”。作为农家子弟,啬翁对土地有深沉的眷恋,期望儿子“将来致力于农”,他夸张地觉得自己创办的垦牧公司“可爱之地、可为之地,中国无过于此者”,信中数次让儿子来垦牧公司参观,希望其爱农归田,承继世业。

大是大非之外,状元爸爸类似于“食少油、勿过饱”之类关于日常琐事的念念碎,更是别有情致,读来感人至深,也饶有趣味。

儿今午不告父即去校,我大不放心,令人各处寻视,此可知《礼记》“出必告,返必面”之为孝。

告诉你,不声不响上学去是不对的,我很着急。更告诉你,出必告,是礼记上载的孝的通识。这样密切联系实际的教育,效果能不好吗!

前见儿讯,有时穿西衣之说。在家与儿母言,怕儿贪凉受爽,因而受病。儿母语父,须即有讯戒勉。不意家庭远虑之日,即儿受寒感疾之日,儿既知岛地寒,何以不小心,经言,父母唯其疾之忧。

儿子远在青岛念书,老夫妻俩在家忧其常穿西服易于受寒,不想在他们讨论的时候,孩子正寒疾着身。讲这一出心灵感应,可能也是真事,更可能要表达儿子的身紧连着父母的心,不可以疏忽,所有放纵,父母皆能冥冥中感应得到。行文到此,又很自然地用了《论语》的典,寓教于关爱,不着痕迹。

儿能做者,须自己做,切勿习懒。记得儿五六岁,吃饭拏凳,皆要自己做,别人做辄哭,可见儿本性是勤,现在寄父之讯,尚托人写,是渐渐向懒,是大病也,儿须痛改!

马屁不天亮。尤其孩子,夸赞几句,其实也是鼓励。要儿改掉懒病,先说一通好话,拍儿子马屁,说他提提时什么事都抢着自己做。其实是孩子好奇好体验的天性,这里被刻意拔高为本性是勤的高度。都这么夸你了,你还好

意思懒么。

平日上课自修之暇,可与润及吴舅舅看有用小说及谈故事;或习拳以疏动。《三字经》言:勤有功,戏无益。如今须在戏上求有益,儿其志之。

也不要整天呆坐死读书,学习间隙还是可以看看小说,打打拳的。《三字经》言戏无益,也要辩证地看,游戏同样可以有益身心。这何止是开明,简直就是大智慧。放在现在,啬翁也可能讲,电竞偶一为之,也有其益也。

支体宜勤动,不宜用过当之力。游戏、击球、亦须有节。睡宜十一时以前,十时尤善。起宜六时,五时尤善。病勿轻服药,尤勿轻服西药。怡儿谨记谨记!

讲的是日常的生活起居,也可以看出他对西风东渐的态度。同样舶来的“击球”无疑利于肢体运动,有益的,有节即可。西药则暂时还吃不准,所以“尤勿轻服西药”。对西方的东西,状元公也是批判地吸收,慢慢地接受。

给儿子写信,传递信息、表情达意之外,有时也有他用。譬如这一通:

昨夜交厂花司务带去《诗韵》并讯,是否此人亲自送校,吾儿亲自收到?念

前诗中“容月窗多隙”,“容”字改“引”字。

正文42个字,关于两个事。一是考察那个花司务是否可靠,嘱其所办之事,是否亲力亲为?可能关系到任用,请孩子提供重要依据。二是给儿子的诗文作业做批改。书中好几通信札有教孩子诗文作法或直接为来函改句读的内容。这可能也是较早期的函授教育。五字诗句,改了一字。儿子原文“容月窗多隙”可能隐舍住处条件艰苦,窗户不密实,颇多缝隙,容得月光筛进来。老子改为“引月窗多隙”,皎洁的月光,多么宜人,故意让窗户留一些缝,把月光引进来。“容引”一字之改,一如著名的“推敲”之问,颇见功力。状元的境界显然比儿子要更高一些。